

# 山西旧石器

贾兰坡 王择义 邱中郎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山西境内的旧石器,虽然在1929年就被古生物学家杨鍾健和德日进教授发现了,但在当时反动政府的统治下,一切的学术事业都得不到它应有的发展,所以这一重要的发现竟一直搁置了20年之久,始终没有机会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解放后,这一门科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取得了极大的繁荣。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基本建设,在建设工程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山西境内的旧石器地点,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自解放之初到目前为止,经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等机构,在山西及其邻接地区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共达173处(包括河南4处、陕西2处)。其中虽有111处是在地表上发现的,但有62处是采自于原生地层中。采自地层中的有洞穴堆积1处,红色土及红色土与黄土之间堆积35处、河湖堆积26处。

旧石器地点在山西境内分布很广泛,北起大同、左云,南至三门峡水库区及晋豫间的黄河两岸;西由黄河边沿,东达寿阳、平定均有发现。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些地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于地点的密集形成了地点群。地点群的分布,主要是在桑干河上游及其附近地区、漳河上游一带、汾河上下游和黄河沿岸。

在解放后发现的173个地点中,已有65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观察和研究,并有报告或简报发表。我们这次的研究是以1957—1958年由地层中新发现的材料为主要对象,至于由地表上捡到的材料,只作为辅助材料使用。但是为了便于我们作地层上与石器性质上的对比起见,也把过去已发表的材料作了扼要的叙述。

由于在周口店发现了中国猿人的石器文化,毫无疑问,在我国境内其他地区也应有同时期的文化存在,特别是在沿太行山区的洞穴中和与周口店同时期的、在华北分布很广的红色土(老黄土或红色黄土)中,更值得注意。可是在过去,除了1933年法国步日耶教授在旅顺至大连的公路旁的红土中(地层是否属于中更新统尚不能确定)采集到2件人工打击很清楚的石英岩石片外,一直到解放前,始终没有更多的材料发现。过去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曾给过各式各样的解释:法国德日进教授认为脉石英的小件石器,由于混杂于自然方所破碎的石英碎块之内,不易识别出来;大砂岩石器或者是由于冲磨与风化作用而销毁掉人工痕迹;至于在山西、陕西、甘肃以及秦岭以北各地,未发现石器遗存,也把它认成了是上述的同样原因。

现在,这一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解放后在秦岭以北,如河南、陕西以及山西南部地区的红色土中都发现了石器。过去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发现石器的原因,毫无疑问,应当归咎于旧社会,是它束缚了这一科学的发展。

所有上述的石器地点,除了村和南海峪二处外,都没有进行过正式发掘。绝大部分的

地点,只是在作其他工作时,顺便作了初步的观察和采集。因之我们这篇报告仍然是报导性质,但根据这一报导,再进行深入调查和系统发掘,会把这一带的石器性质完全揭露开来。我们为了便于说明,依照地层的上下关系和堆积的性质,把山西及其邻近地区新发现的石器文化暂时分为三类。这三类文化是:“红色土系统中的文化”、“黄土底砾石层中的文化”和“黄土系统中的文化”。

### 红色土系统中的文化

红色土中的石器的发现,在学术上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是把这一地区含石器的红色土的时代,可以局限于中更新统的范围之内,对第四纪地层的划分上给了一个依据,而且由于这一系列的发现又足以证明当中更新世——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时候,人类在这一带已广泛存在,这就给祖国的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在华北分布很广的红色土,代表着一个很长时期的堆积物,它包括了整个的中更新统的建造时期。将来经过系统发掘,依靠更多的文化遗物,完全有可能把它分为几个不同的文化时期,但目前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暂时分为前后两期。

根据发现人王择义对地层的观察,认为有的石器是发现于红色土的深处或比较深处;有的是发现于红色土的上部。属于红色土的深处或比较深处的石器,我们初步判断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目前暂时定下来的地点有:陕西潼关的张家湾、卧龙铺,河南陕县侯家坡和山西垣曲的官沟、东岭、柴火圪塔、坪道、八角凹、小赵村、申家庄、型马南窑、晁家坡、许家庙、河西坡等处。所有地点的文化均以石器为代表。

上述各地点的石器,在性质上说是原始的,不论是打片和加工的技术与石器的类型,都未超出中国猿人的石器之上。象中国猿人使用的、较为精致的尖状器,在红色土深处或比较深处就从未见到。特别有意义的是由垣曲同善镇河西坡含石器的相同地层中发现过三门马(*Equus sanmenensis*)的残破上颌骨;在许家庙含石器相同地层中也发现了一件鼯鼠的头骨,根据头骨的性质应归于丁氏鼯鼠(*Siphneus tingi*)一组,特别是与大丁氏鼯鼠(*Siphneus epitingi*)接近。这两种动物都是比较原始的,前者见于下更新统及中更新统中下部地层中,后者见于中更新统底部地层中,这两种动物也支持了这一文化是原始的一种说法。

根据目前已有的材料,我们判断这一带的红色土深处或较深处的文化,也不象比中国猿人文化为晚。

红色土深处或比较深处的石器和中国猿人的石器相比,基本上保持着相似的性质。所发现的大小石片,绝大部分都保持着大的石片角(一般都超过 $100^\circ$ )。石核的台面和劈裂面之间的角度都相当小,而且也经常利用自然石面作为台面来打击石片。打击石片的方法,不仅使用了直接打击法,也使用了碰砧法和砸击法。这一征状和中国猿人的石片与石核的性质是相符的。特别是由垣曲红色土中发现的砍斫器,大部分都是向砾石的一面打击的,这一现象与中国猿人的砍斫器相比,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同样,向砾石一面打击的砍斫器也是由扁长砾石的平坦的一面向相背较凸的一面打击;而且由石片疤还可以看出来,有的是用石锤直接打击的,有的是用碰砧法摔击而成的。象这样加工的砍斫器也是中国猿人常用的方法。



以看出彼此間的連系关系。

丁村的石器,在类型上比以前增加了,有单边和多边形器、大三棱尖状器、小尖状器、单边和多边砍斫器(一部分可以称之为“两面器”)和球状器等。大三棱尖状器、球状器、加工比較精細的多边形器和可以称之为“两面器”的砍斫器,都是在以前的时期里,从未見到或很少見到过的。

匭河的石器和丁村的石器相比,也有相象处,比如其中有一件三棱的器物,尽管殘缺了尖端,但根据它的石片形状与加工的情形,可以认为和丁村大三棱尖状器是一致的。由匭河发现的石核和石片,由性質上看也是在丁村地点里常見的,特别是善于在石核的銳棱上打击石片和 在石砧上摔击石片(碰砧法),也都是丁村文化中的最普遍的現象。因此我們认为匭河石器和丁村石器保持着密切关系。

由凤程山也发现有一件大型尖状器,加工多集中于大石片的背面,一端鈍厚、一端紧縮成尖。無論是加工的方法或器物的形状与大小也都和丁村大三棱尖状器保持着相似的关系。

### 黄土底部砾石层中的文化

由黄土底部砾石层中发现的石器,在这个地区內也分布很广。我們目前大致可以确定的地点有宁武的楊庄、朔县的后圪塔峯、保德的火山和离山的黄河岸边(楊鍾健和德日进发现,地点位于陕西吳堡黄河对岸)、中阳的許家坪(楊鍾健和德日进发现)等处;此外在河南灵宝孟村的石器,也可能是来自于黄土底部砾石层。至于由寿阳的疊山、尹家庄、高墘和平定的枣烟、大梁丁等处的石器則是发现于黄土与紅色土交接处,中間虽无底砾层相隔,但由层位的上下关系,也可以把它們划归到黄土底部砾石文化的时代之內。

这一地区的黄土底部砾石文化,在目前來說,应以朔县后圪塔峯地点最为重要。根据初步調查的結果,它不仅分布面积較大,埋藏的石器丰富,而且还有哺乳动物化石发现。

后圪塔峯的石器是比較小的,以各式各样的刮削器为多。刮削器的加工大部分集中于石片的背面,只有一小部分向劈裂面加工。但不論是向劈裂面或是向背面加工則多限于石片的一面。其中有一件刮削器,加工的痕迹頗为平整,只有丁村的舌形尖状器,可以与之相比。此外还有三件尖状器,其中的二件是将小砾石由中間剖开,再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而成一尖。

根据我們手中現有的、由底部砾石层中发现的石器,虽然可以說是比较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中国猿人文化、周口店第 15 地点文化、紅色土深处或比較深处的文化有所进步,但由于材料的限制还不能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水洞沟或陝北的薩拉烏苏河文化作出可靠的对比。但这批材料由层位上和打击技术上看,則应放在上更新統底部( $Q_3$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范围之內。

### 黄土系統中的文化

黄土系統中的文化在平陆的七里坡、大同的馬坡山、朔县的梵王寺、河曲(1929年楊鍾健和德日进发现,地点在巡檢司之南的黄河岸)等处均有发现。由黄土系統中发现的文化,无問題是应当包括旧石器时代中期和后期的文化在內。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在山西

境内发现的材料还很少，尚不能詳知其文化性質，因之不仅不能和代表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水洞沟和薩拉烏苏河的文化相比，而且也还不能和代表我国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山頂洞文化相比。不过我們觉得梵王寺的石器頗值得注意。

梵王寺的材料虽然是由灰黄土的一个窑洞附近捡到的，但它附近的基岩为石炭——二迭紀岩系，在这老的岩系之上只有一层深紅土，附近再无比灰黄土更新的地层，因之我們认为梵王寺的材料系来自灰黄土层中（在灰黄土的窑洞内原生的土壁之上还保存有殘破的骨化石）。

由梵王寺見到的材料有尖状器和刮削器。尖状器有二件，原料为石英岩，二件都是由厚石片的两側边緣向一端加工，使之成尖。尤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一件的加工只限于右緣，反正面都是如此，象这样加工的尖状器，过去只在中国猿人的石器中見到过。关于这一地点的时代我們推测不会很晚，因为和石器一起还捡到了披毛犀(*Rhinoceros tichorhinus*)的化石；但也不能早到黄土底部砾石的时代，因为不仅在当地未見到底部砾石，而且由披毛犀的石化程度上看，也不象是黄土底部砾石层中的产物，因而我們把它放在黄土系統之内，并认为它的时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sup>1)</sup>。

通过这次对山西及其邻接地区的石器研究，我們得有如下的印象：

(一)时代最早的文化，是在陝西潼关、河南陝县与晉南的垣曲地区。就这次所报导的石器地点看来，愈近南部地区时代愈古老，愈往北部則时代愈晚。比如在陝西潼关和山西垣曲境内，发现的石器是位于紅色土的深处或比較深处，在河南陝县的侯家坡由紅色土下部砾石层中还发现过人工打击的石片（当然同一地区也有晚期的文化存在）；但到了汾河的上游，石器則見于紅色土的頂部，再往北則时代更晚。因此我們认为在华北地区内最古老的人类遺骸和文化遺物，似乎是在秦岭北麓一带地区。由石器的层位上显示出（寻找古老的人类遺骸和文化遺物）南部地区的希望要比北部为大。

(二)由石片加工成的尖状器，在我国境内几乎在各个时代里都有发现，它不仅見于中国猿人化石产地、周口店第15地点、丁村、水洞沟和薩拉烏苏河，而这次又見于垣曲的紅色土中和朔县后圪塔峯的黄土底部砾石层中以及大約代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梵王寺等地点。它們的制作方法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这一器物的普遍存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可以說是在研究我国(华北)的原始文化的关系(時間和空間)上的一条束帶。

最后我們还应该指出，我們应该根据已发现的地点，有重点地作出系統的发掘和扩大区域調查；根据将来更多的材料，我們完全可以建立起我們自己的、完整的(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系統，这个文化系統的建立，十分重要，它不仅是研究我国原始文化最初阶段的基础，而且它还有助于地質学家对华北地区的第四紀地层的划分。

1) 山西阳城固隆村朝神山蓋頂砂質紅色壤土中發現的石器，也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另有报告发表。